

Martin

批评家之死

Walser

〔德〕马丁·瓦尔泽 著
黄燎宇 译

Kritik

本书在德国引起强烈争议

人民文学出版社

Tod eines Kritikers

批评家之死

〔德〕马丁·瓦尔泽 著

黄燎宇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 - 2003 - 1408

Martin Walser
Tod eines Kritikers

©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批评家之死/(德)瓦尔泽著;黄燎宇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9
ISBN 7-02-004676-2

I. 批… II. ①瓦…②黄… III. 长篇小说-德国-当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55473 号

责任编辑: 欧阳韬 装帧设计: 何 婷
责任校对: 刘光然 责任印制: 王景林

批评家之死

Pi Ping Jia Zhi Si

[德] 马丁·瓦尔泽 著

黄燎宇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70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6.25 插页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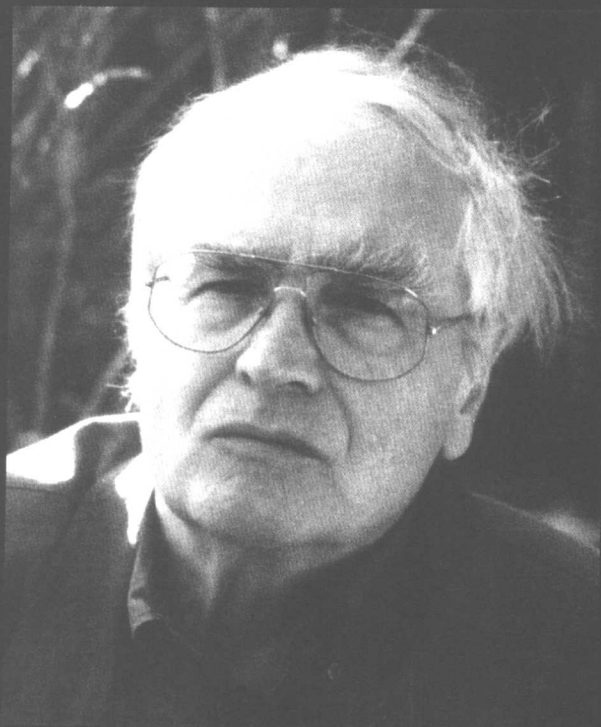
200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6000

ISBN 7-02-004676-2/1·3577

定价 15.00 元



马丁·瓦尔泽

《批评家之死》风波(译者序)

二〇〇二年德国文坛最重要的事件无疑是马丁·瓦尔泽的长篇新作《批评家之死》所引起的风波。五月二十九日,德国首屈一指的日报《法兰克福汇报》发表了该报文艺部主任弗兰克·席尔马赫致马丁·瓦尔泽的公开信,宣布他们不会提前连载《批评家之死》,瓦尔泽不仅在书中以文学方式对批评家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又译:马塞尔·莱希-兰尼斯基)实施报复或者说谋杀,而且上演了一系列“反犹太主义的保留节目”。此言一出,舆论哗然。德国社会随即爆发了一场以瓦尔泽和他尚未出版的《批评家之死》为主题的舆论大战。打响第一枪的《法兰克福汇报》继续组织对瓦尔泽的批判,一面刊登义愤填膺而又天真无邪的读者来信,一面抛出冷静老到的分析文章。一位读者写道:“瓦尔泽用如此险恶和残酷的方式表达对我们最优秀、最有趣的一位文学批评家的仇恨,真是难以置信。如果有朝一日德国的犹太人认为非离开德国不可,所有正派的公民都会跟他们一道走”;批评家马利乌斯·梅勒则把他对该书所做的“外部研究”结果公诸于众:在《门诊时间》中出现了犹太批评家(埃尔·柯尼希和玛萨·弗蕾迪)糟蹋德国作家(汉斯·拉赫)褒扬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斯^①)的局面——梅勒知道玛萨·弗蕾迪

① 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 1933—),美国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再见吧,哥伦布》(1959),长篇小说《放任》(1962)、《情欲教授》(1977)、《捉刀作家》(1979)、《人性的污秽》(2000)、《垂死的动物》(2001)等。——译注(下同,不再一一注明)。

的原型是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菲利普·罗斯有犹太血统。几乎与《法兰克福汇报》势均力敌的《南德意志报》毫不犹豫地唱起了反调。评论家托马斯·施泰因菲尔特认为，对一部尚未问世的作品横加挾伐，可谓闻所未闻；在与瓦尔泽和赖希-拉尼茨基都有密切私交的文学评论家约阿希姆·凯泽看来，《批评家之死》“没有反犹倾向，但是写得很漂亮，很恶毒，很放肆”；奥地利犹太女作家伊尔莎·艾辛格悲叹瓦尔泽已成为“一种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与此同时，另外几家赫赫有名的德文报刊——如《新苏黎世报》、《法兰克福评论》、《时代周报》、《焦点周刊》和《明镜周刊》——也都做了相关的评论和报道。一些地方报纸和网上论坛也不甘寂寞，纷纷发言表态。在这场舆论大战中，有针锋相对的观点，也有前后矛盾的报道。譬如，有人说瓦尔泽学生时代的女友、具有犹太血统并且被视为反犹问题专家的露特·克吕格认为《批评家之死》不是反犹小说，后来又有人说，克吕格认为《批评家之死》的确具有反犹倾向；《法兰克福汇报》一度报道，瓦尔泽的小说使匈牙利犹太作家凯尔泰斯·伊姆莱深受伤害，几天之后又被迫进行更正，因为凯尔泰斯说的是“瓦尔泽深受伤害”。急剧升温的争论甚至让政界人士感到不安。德国联邦议会文化委员会主席、社会民主党人莫尼卡·格利法恩认为，《批评家之死》紧跟在默勒曼事件之后出现，自然“极具挑衅意味”，基督教民主联盟秘书长劳伦茨·迈耶则呼吁文艺界人士在讨论反犹问题时要“注意遣词造句，以免造成误解”。

面对这等形势，苏尔坎普出版社也举棋不定，左右为难。一方面有人反对出版该书，其中包括赖希-拉尼茨基和哈贝马斯这类重量级人物，后者声明说，如果这样一本触犯了道德底线的小说得以出版，他将退出苏尔坎普出版社基金会（他于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和其他人一道退出了基金会，但不是因为瓦尔泽，而是其他原因）。另一方面，社会上要求出版《批评家之死》的呼声日益高涨，网上盗版日益猖獗。六月五日，出版社终于拍板，决定将原定八月出版的

《批评家之死》提前出版。六月二十六日,《批评家之死》终于在书市亮相。不到三周便高居文学类畅销书排行榜,两个半月的销量就已接近二十万册。相关的讨论也更加热烈。因资助“德国国防军暴行”展览而成为新闻人物的文学教授扬·菲利普·里姆茨玛(他也是《批评家之死》第三部第一章提及的里姆茨玛烟草公司创始人之后)在《法兰克福汇报》历数《批评家之死》的反犹罪状,其中包括给批评家安上一根有点犹太特征的鼻子。《新苏黎世报》随即嘲笑里姆茨玛的阅读方式过于粗枝大叶,因为那根鼻子并没有长在埃尔-柯尼希,而是长在汉斯·拉赫的脸上。与瓦尔泽时常发生歧见的君特·格拉斯也出来为瓦尔泽鸣不平。格拉斯不想对《批评家之死》的艺术水准发表评论,对于“反犹说”却是嗤之以鼻。他在《奥格斯纳布吕克报》上写道:“那些据说有反犹倾向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反犹倾向。我认为那些批评家们言而无据。”格拉斯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批评家之死》的读者十有八九难逃由席尔马赫的指控所决定的“期待视阈”,不得不把这部作品当作“反犹小说”来读。说《批评家之死》是“影射小说”,不会引起太大的争议,因为埃尔-柯尼希一望而知是赖希-拉尼茨基的漫画像,不管人们对这幅漫画有何道德或者艺术评判;说到“反犹小说”,读者多半要皱起眉头,因为席尔马赫所控诉的“反犹主义的保留节目”惟有透过席尔马赫的有色眼镜才能看到:用希特勒式的语言——“反击从今夜零点开始”——来恐吓具有犹太血统的批评家,用心何其歹毒;嘲笑批评家发音不标准,实际是在讽刺意第绪语(历史上生活在东欧的犹太人所使用的内部交流语言);“遇害可不符合安德烈·埃尔-柯尼希的形象”,埃尔-柯尼希夫人这句耐人寻味的话是在影射因为辱骂耶稣而被罚“永世流浪的犹太人”(里姆茨玛则认为瓦尔泽在戏仿托马斯·曼针对犹太学者特奥多尔·莱辛^①被纳粹特务刺杀一

① 特奥多尔·莱辛(Theodor Lessing, 1872—1933),德国哲学家、政论家。

事所做的恶毒评论：“这么死符合他的形象”）；把批评家描写成一个好女色、好贬低和否定他人的形象，这是文学中常见的反犹笔法，等等。许多反驳席尔马赫的学者都提醒他别忘了一个基本事实：反犹思想的本质特征，在于假定犹太人身上都有洗刷不掉的“犹太本性”，《批评家之死》从未将埃尔-柯尼希的审美缺陷和道德污点归咎于“犹太本性”（据统计，埃尔-柯尼希的“突出”特征有六十九个，其中能够与他悬而未决的犹太人身份勉强挂钩或者说能够解释为反犹滥调的仅占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反犹滥调反倒有可能从席尔马赫的牵强附会中诞生。由于席尔马赫的观点没有得到足够的文本支持，他发难的动机也受到质疑。偏激者干脆斥之为恶意炒作或者说苦肉计。批评家乌尔利希·格莱纳便指责当事各方“不讲道德卫生”，指责他们通过一场“肮脏的游戏”来扩大自身在媒体的影响力。

但是，《批评家之死》风波不是什么游戏，因为当事各方都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瓦尔泽遭到前所未有的猛烈批判和攻讦，史学家布里吉特·哈曼甚至公开表示有必要采用法律手段来对付瓦尔泽，瓦尔泽本人一方面也声称要用法律手段来对付恶意损害其名誉的做法，另一方面承认自己“万万没想到有人会把这本书跟大屠杀扯到一起，想到了就不会写了”。一向威风凛凛的批评霸主赖希-拉尼茨基，第一次在德国文坛尝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滋味，所以他给瓦尔泽定了最为严重的罪名：《批评家之死》的中心思想是“打死他，这个狗东西！他是犹太人”（席尔马赫抨击瓦尔泽仅仅从字面上去理解歌德的名言：“打死他，这个狗东西！他是评论家”。他还说，一九四五年以后的德国还没有见过这么反动的书，他为这个国家“感到恐惧和悲哀”）。掀起《批评家之死》风波的《法兰克福汇报》，不仅留下“派性”、“狭隘”等恶名，而且遭遇了一阵解除订报合同的风潮。

有人说，《批评家之死》风波是一场“小题大做的闹剧”，也有人

称之为“联邦德国文学史上的头号丑闻”。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不能就此把事情简单地归咎于《法兰克福汇报》的狭隘或者派性(赖希-拉尼茨基在《法兰克福汇报》担任了十五年的文学部主任,他也栽培过席尔马赫)。《批评家之死》之所以引发如此一场文学一政治风波,是因为它牵涉到敏感的人物和敏感的话题,而且碰上比较敏感的时间。

《批评家之死》的作者是瓦尔泽,它所讽刺的对象是赖希-拉尼茨基。这已形成强强对峙的局面。赖希-拉尼茨基何许人耶?他一九二〇年出生在波兰,父母都是犹太人。一九二九年全家迁居柏林。一九三八年他在德国中学毕业后作为犹太人被驱逐出境,回到波兰。一九四〇年起在华沙犹太隔离区的“犹太人委员会”做翻译。一九四二年其父母被纳粹杀害。一九四三年逃脱犹太隔离区。一九四五年加入波兰共产党(波兰工人党)。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年在波兰驻伦敦总领馆工作。一九五〇年被波兰工人党开除出党。其后几年一度被波兰当局禁止发表和出版。一九五八年利用出国之机移居联邦德国,并很快在文学批评界站稳了脚跟。如今他在德国已是家喻户晓的“文学教皇”,是一个堪称超级巨星的批评家,一个让文学通俗化、大众化、娱乐化的奇才。公众喜欢他的文字,更欣赏他的现场或者电视形象。作家们畏惧他的批评,因为他把“颁发死亡证书”视为己任,喜欢将人一棍子打死,但是他们更怕他沉默,因为他的沉默会更加严重损害他们的新作。与他对垒的瓦尔泽也绝非等闲之辈。瓦尔泽一九二七年出生于博登湖畔的瓦瑟堡,二战后期服过一年兵役,一九四六至一九五一年在雷根斯堡和蒂宾根攻读文学、哲学、历史,获博士学位,随后在南德意志电台、电视台做过几年记者和导演。一九五三年加入对联邦德国文学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四七社”。他和同岁的君特·格拉斯及年长十岁的海因里希·伯尔同属战后德国文学的代表人物。他没有像他们二位那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这并非因为他缺少艺

术成就和艺术才华。他著述甚丰,涉猎广泛。他有创作有理论,既写长篇小说(多达十几部)也写中短篇,早年还写过剧本。他还撰写了诸多反响甚大,甚至具有轰动效果的政论、随笔、演说辞。从某种意义上讲,马丁·瓦尔泽约等于忙于五彩斑斓的写作生活的汉斯·拉赫加上醉心于高深学术研究的米夏埃尔·兰多尔夫。瓦尔泽也得到了社会的充分认可,他获得的各种奖项有十几个,其中包括联邦德国顶尖级文学奖格奥尔格·毕希纳奖和德国政府颁发的大十字功勋奖章。此外,他还享受着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德国作家在有生之年享受过的待遇:雕塑家彼特·林克为瓦尔泽塑造了一尊具有怪诞风格的悬崖勒马的塑像(取材于他的中篇小说《逃马》),塑像自一九九九年六月起便矗立在瓦尔泽的居住地——博登湖畔的于伯林根。然而,这周身的荣誉勋章并不妨碍瓦尔泽成为争议人物: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是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左派,八十年代他因为主张两德统一而被怀疑具有民族主义思想,九十年代人们议论他是否有逃避历史的倾向。瓦尔泽的名气也未能阻止赖希-拉尼茨基在将近四十年的批评实践中对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赖希-拉尼茨基对他的长篇小说《爱的彼岸》(1976)的评论在文学圈内无人不晓:“这是一本无足轻重、糟糕透顶、惨不忍睹的小说。这本书不值得读,哪怕就一章、一页……为己为他,我们希望这本书尽快被人忘掉。”当然,赖希-拉尼茨基也不否认瓦尔泽是个天才。他在评论长篇小说《时间过半》(1960)时便感叹说:“也许还从来没有一本写得如此糟糕的作品表现出如此巨大的才华。”他甚至把瓦尔泽看做“他那一代作家中最有特色的一个”。对于瓦尔泽,“文学教皇”既是挥之不去的梦魇,也是长期研究的对象。他自述在一九七六年九月的一个夜晚梦见赖希-拉尼茨基追着他谈话,他在一九七七年写过一篇题为《论教皇们》的文章,一九九三年又把“教皇”写进了长篇小说《互不相干》。让瓦尔泽感受最深的,是批评家的话语霸权——赖希-拉尼茨基在德国电视二台主持十三年之久的

《文学四重奏》便是例证，特别是电视带来的绝对话语霸权。他用了一个德国式比喻来表达那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感觉：“就我俩的关系而言，他是施暴者，我是受害者……其实任何一位受他虐待的作家都可以对他说：赖希-拉尼茨基先生，就我俩关系而言，我是犹太人。”

批评家得罪作家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作家恨批评家同样自然（赖希-拉尼茨基更把作家对他的深仇大恨视为荣耀，他在自传《我的一生》中便不无快意地讲述了有多少德语作家想要他的命），所以让批评家死去的小说屡见不鲜，公众一般也都处之坦然。譬如，法国作家皮埃尔·西尼亚克虚构过以法兰西的批评大家——包括大名鼎鼎的贝尔纳·皮沃^①——为对象的连环杀人案（《费迪南·塞利纳》，1997），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让一个作家把一个批评家推下了地铁站台（《脸在何方》，2002），德国作家博多·基尔希霍夫也让一个酷似赖希-拉尼茨基的批评家命丧黄泉（《黄色小说》，2002）。《批评家之死》并未让批评家死去，却已掀起如此道德狂澜，主要因为它触及到犹太人问题。德国是一个对犹太人犯下滔天大罪的民族，德国人也知罪认罪，所以才有联邦总理威利·勃兰特一九七〇年十月在华沙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前庄严下跪。忏悔历史，杜绝一切反犹倾向，这是联邦德国所确立的一项基本的社会道德和政治原则。反犹行动，反犹言论以及各种勾销或者淡化灭犹罪行的企图，全都受到舆论、法律乃至国家机器的约束（一些地方的犹太教堂门口常见荷枪实弹的宪兵把守）。一方面是深刻的忏悔意识和高度的政治觉悟，一方面是根深蒂固、改头换面的反犹观念，这一形势决定了德国社会有关反犹问题和历史问题的讨论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譬如，许多德国人对“Der Jude”（犹太

^① 贝尔纳·皮沃（Bernard Pivot，1935—），法国文学批评家，电视文学节目主持人。著有《理想藏书》（1988）等。

人)这个词存有心理障碍。他们知道“Der Jude”过去是贬义词,他们也知道这个词现在不应该带有贬义,但是他们却因为担心对犹太人不敬而常常避免使用这个词(不说“某某是犹太人”,只说“某某出生在犹太家庭”等)。赖希-拉尼茨基就和《法兰克福汇报》的某个负责人讨论过能不能说“Der Jude Kafka”(犹太人卡夫卡)。由于那段史无前例的灭犹历史,德国人也闹不清楚作为一个民族他们何时才能抬起悔罪的头。萨克森州司法部长、一度被提名为联邦总统候选人的斯特凡·海特曼便因为说了一句“我们必须成为普通民族中的普通一员”而让人怀疑他想扔掉德国人的历史包袱。出于同样的原因,德国人也在能否以及如何批评以色列这个问题上感到困惑。德国自由民主党副主席、曾任科学教育部和经济部部长的尤尔根·默勒曼,就因在和德国犹太人协会副主席弗利德曼的辩论中说了下面两句话引起舆论哗然:“可惜在德国反犹分子,我们必须与他们进行斗争,但是我担心,恐怕没有谁比沙龙先生和德国的一位弗利德曼先生——此人尖刻傲慢而且不宽容——招来了更多的反犹分子。这样可不行,我们德国人必须能够做到可以批评沙龙的政策而不必被扣上反犹的帽子。”人们纷纷谴责默勒曼带有“犹太人必有可恶之处”的弦外之音。值得注意的是,德国人已经把足球术语嫁接到频繁而严肃的反犹问题讨论,他们越来越喜欢谈论A牌:A=Antisemitismus(反犹),A牌=给反犹分子准备的黄牌或者红牌。

默勒曼事件出现在二〇〇二年五月中旬,距离席尔马赫发难只有两周时间,所以瓦尔泽很快就被比做“文学界的默勒曼”。对此,有人替他喊冤,有人说他活该。说他冤枉,是因为他写过两篇带有发聋振聩的标题的文章:《我们的奥斯维辛》(1965)和《说不尽的奥斯维辛》(1979),是因为他对犹太人,特别是德国犹太人的文化成就有着浓厚的兴趣;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他就研究起一个还不太惹人瞩目的犹太作家:卡夫卡,他也是德语国家撰写以卡夫卡

为主题的博士论文(1951)的第一人;他发现(1989)并且促成了犹太学者维克多·克莱姆佩勒日记的出版(1995),这些日记在读书界引起巨大反响;《批评家之死》又证明他对犹太神秘主义颇有研究。认为应该对瓦尔泽亮A牌的人,多半对他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一日在法兰克福保罗教堂发表的演讲耿耿于怀。当时,因为“让德国人理解了自己的国家,让世界理解了德国”而获德国书业和平奖的瓦尔泽,在答谢致辞中再次谈到如何对待奥斯维辛的问题。他对“奥斯维辛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表示了不满。他不仅承认自己至少有二十次遇到恐怖的集中营画面时“扭头不看”(wegschauen)——此举违背了“正视”(hinschauen)历史的道德律令,他还质问“无休止地呈现我们的耻辱”是否已经公式化和工具化,是否变成了一根“道德大棒”。瓦尔泽还明确反对在柏林市中心修建犹太大屠杀纪念碑的计划,因为这无异于“在首都的心脏用混凝土构筑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噩梦”,无异于“把耻辱化为巨型艺术”。瓦尔泽的讲话结束后,包括联邦总统在内的现场听众起立鼓掌,惟有德国犹太人协会主席伊格纳茨·布比斯夫妇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两天后,德国媒体纷纷报道布比斯说瓦尔泽搞“精神纵火”,同时就瓦尔泽是否想给德国人的悔罪历史划上句号这一问题展开如火如荼的讨论(相关争论已汇编成集)。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二日,瓦尔泽和布比斯与在《法兰克福汇报》编辑部进行对话,两人都认为还需要用更为恰当的词汇来谈论大屠杀历史,布比斯也收回了“精神纵火”的说法。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德国联邦议会决定实施修建大屠杀纪念碑的计划。犹太裔美国建筑大师、大屠杀纪念碑的设计者彼特·艾森曼一针见血地指出,是瓦尔泽促使联邦议会做出了这一决定。当时的瓦尔泽对他的祖国和同胞感到非常失望,所以他有过移居奥地利的念头。而赖希-拉尼茨基在自传《我的一生》(1999)中对瓦尔泽的保罗教堂演讲及其反对建造犹太人纪念碑的态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批评家之死》的读者如果经历了《批评家之死》风波,多半会获得一个重大发现:第二部第二章开头所描写的反犹问题大讨论与二〇〇二年夏天德国舆论界围绕《批评家之死》展开的讨论有着惊人的相似,现实的风波成为虚构的风波的延续。瑞士作家阿道夫·穆施格感叹说:“现实在模仿瓦尔泽的模仿作品”,博希迈耶则联想到王尔德的名言:Literature always anticipates life(文学总是先于生活一步)。可是,人们在佩服瓦尔泽的先见之明的同时不禁要问:瓦尔泽既然深知同胞们谈“犹”色变,他为什么偏偏要在这部旨在表达自己“对电视时代文化界的权利运作的体验”的作品里附带一笔敏感的犹太人问题?这一笔给他惹出不少的麻烦,席尔马赫便指责他用“闲来之笔给全书点题”,他本人也感叹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瓦尔泽是有意还是无意?是考虑不周,还是打算摸摸“政治忌讳”的老虎屁股?问题的答案恐怕需要读者自己去寻找。

黄燎宇

二〇〇四年五月

第一部 涉 案

1.

既然大家并不期望我来撰写我自己觉得非写不可的东西,我就必须谈谈我为什么要插手一件即便我不插手似乎也已闹得沸沸扬扬的事情。神秘主义,喀巴拉^①,炼金术,罗森克罗伊泽学派^②……感兴趣的人都知道,这才是我的研究领域。为了插手一件每天都有新进展的事情,我的确中断了《从绍伊瑟到尼采》一书的撰写。我所中断的,与其说是写作本身,不如说是为写作所做的准备工作。书的内容:首先把个性色彩带进德语的,不是让尼采获益匪浅的歌德,而是更早的绍伊瑟,埃克哈特,伯麦^③。由于资产阶级文化精英的语言造就了我们的体验能力和认知能力,所以我们,也就是读者,看不出神秘主义者和歌德,和歌德之后的尼采一样,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他们的差别仅仅在于,前者快乐和痛苦的根源不是女孩,不是男人和女人,而是上帝……

我不得不做上述说明,因为我在撰写我的朋友汉斯·拉赫^④的故事的时候,有可能受我平时写作风格的影响。我们俩,汉斯·

① 喀巴拉(Kabbala):一种犹太神秘主义学说。

② 罗森克罗伊泽学派(Rosenkreuzertum):出现在17世纪的一个神学流派,主张神学和哲学的统一。在18世纪对共济会和普鲁士王宫影响甚大。

③ 绍伊瑟(Heinrich Seuse, 1295—1366),埃克哈特(Eckhart, 1260—1328),伯麦(Jakob Böhme, 1575—1624),德国神秘主义的代表人物。

④ 汉斯·拉赫(Hans Lach):在德文中含有“笑者”之意。